

歷史

历史文化文库  
LI SHI WEN HUA WEN KU

王文虎◎著

# 隨州文化史



SH

中国言实出版社

王文虎◎著

# 随州文化史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随州文化史 / 王文虎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171-2339-2

I . ①随… II . ①王… III . ①文化史—随州 IV .  
① K29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3705 号

责任编辑 : 郭江妮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 100101

编辑部 :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 100088

电 话 :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 [www.zgyscbs.cn](http://www.zgyscbs.cn)

E-mail : [zgyscbs@263.net](mailto: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20.25 印张

字 数 352 千字

定 价 62.00 元 ISBN 978-7-5171-2339-2

# 自序

本书是著者对自己的随州文化研究所做的一次总结。

在研究随州文化的过程中，著者先后提出了“湖北区域文化随州学派”“随州文化三次浪潮”“随州文化四大形态”等看法。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在湖北区域文化中，随文化是与楚文化相并列的文化体系。从史前烈山氏到战国时期，其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三次浪潮”：炎帝神农文化为第一次浪潮，它将随州推向中国农耕文化高峰；季梁思想为第二次浪潮，它将随州推向中国民本文化高峰；曾侯乙编钟文化为第三次浪潮，它将随州推向中国青铜礼乐文化的高峰。此后，从战国至民国时期，随州文化虽然有许多精彩的内容，但再也没有形成先秦以前那样的思想高峰。在已经出版的《大贤季梁》《神农氏世与随州史前社会》《随州文化探源》等书中，著者表述了这些观点。不过，以上诸书并没有将战国以后的随州文化纳入研究视野。为了弥补这个缺点，著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从战国至民国时期的随州文化纳入了研究范畴，并试图以“生活方式及价值选择演化史”这样一个文化史概念，将这个研究整理为一个系统。我发现，在以“生活方式及价值选择演化史”为指导整理的系统中，“三次浪潮”这个概念已经不够用了，著者即以“随州文化四大形态”为框架尝试从形态分析着手，将随州从战国至民国时期的文化划分始祖形态、侯国形态、郡县形态化、国民形态四态。始祖形态属于随州农耕生活方式的确立期，侯国形态在农耕生活方式基础上确定了随州文化的价值取向，郡县形态的随州文化保留了原有的农耕生活方式，价值选择虽然在不同时期有若干新内容，但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而在民国形态的随州文化中，随州人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在价值选择上都有了工业化的取向。这就是著者对随州文化发展史的看法，是否正确，由读者评判。

2017年1月15日

# 目 录

绪 论.....	1
----------	---

## 第一篇 随州史前时期的文化

第一章 从神话看随州文化史的起始.....	21
-----------------------	----

第一节 桐柏山盘古神话的文化时代 .....	21
------------------------	----

第二节 大洪山神话的文化时代 .....	24
----------------------	----

第二章 与考古相对应的炎帝神农文化.....	27
------------------------	----

第一节 随州新石器时代文化特点 .....	27
-----------------------	----

第二节 随州考古与炎帝神农氏的功德传说 .....	32
---------------------------	----

第三节 烈山氏、炎帝及神农氏与随枣走廊的文明温床 .....	39
--------------------------------	----

第三章 史前时期随州先民的宇宙概念.....	43
------------------------	----

第一节 “外圆内方”的几何图案与盖天说的起源.....	43
-----------------------------	----

第二节 西花园文化中的“太极图”.....	48
-----------------------	----

第四章 史前时期随州先民的宗教信仰与艺术世界.....	53
-----------------------------	----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晚期随州先民的文字探秘 .....	53
----------------------------	----

第二节	随州先民对灵魂及死后世界的关注	55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随州先民的宗教意识	57
第四节	新石器时代随州先民的艺术生活	66

## 第二篇 随州夏商周时期的文化

第一章	夏商时期的随州文化	71
第一节	夏代随文化	71
第二节	商代随文化	77
第二章	鄂厉唐文化简说	81
第一节	鄂国文化	81
第二节	厉国文化	85
第三节	唐国文化	87
第三章	曾随文化探源	89
第一节	曾随之谜	89
第二节	曾国的制度文化	94
第三节	曾国的神话体系	97
第四节	曾国的祭祀文化	100
第五节	曾国的科学文化	101
第六节	曾国的艺术文化	109
第七节	曾随灭国之谜	110
第四章	季梁民本思想	113
第一节	季梁本事及其思想要点	113
第二节	季梁思想的内容	118
第三节	季梁思想对诸子之学的影响	133
第四节	季梁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146

<b>第五章 隋巢子、许行思想初探</b>	153
第一节 隋巢子及其学说	153
第二节 许行及其“神农之言”	157

### 第三篇 随州封建时期的文化

<b>第一章 秦汉时期的随州文化</b>	163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随县辖区变化	163
第二节 “劝民农桑”：返农弃商的价值取向	165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随县社会风气与文化教育	167
第四节 “任侠”取向的发展：秦汉时期的随县农民起义	170
第五节 孔家坡汉简《日书》的思想分析	173
<b>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随州文化</b>	179
第一节 随地南北转型及国家符号“隋”的形成	179
第二节 随地蛮族流动及其盘瓠神话	182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所记随州风物	184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州民俗	185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在随州的传播	188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随州“四戏”	190
<b>第三章 隋唐时期的随州文化</b>	194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随州政治地位	194
第二节 隋唐时期随州文化的经济基础	199
第三节 “惠政”与“无政”之间的价值选择	202
第四节 隋唐时期的随州文化教育	206
第五节 隋唐时期的随州文学创作	208
第六节 隋唐时期的随州宗教文化	210

<b>第四章 宋元时期的随州文化</b>	<b>217</b>
第一节 随州的地理位置及文化特色	217
第二节 宋元时期经济发展对随州文化的影响	220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随州教育及人才	222
第四节 随州文化与欧阳修的诗文革新	224
第五节 宋元时期随州的宗教文化	227
第六节 宋元时期随州的神农祭祀	233
第七节 从维护“治统”到维护“道统”的升华	235
第八节 宣昭的书法艺术	240
<b>第五章 明清时期的随州文化</b>	<b>242</b>
第一节 明清时期随州农耕文化中的商业选择	242
第二节 明清时期随州乡里结构的文化蕴涵	245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随州教育文化	248
第四节 明清时期的随州社会风俗	251
第五节 朱奇生的理学追求	253
第六节 明清时期的随州炎帝神农祭祀	255
第七节 明清时期的随州曲艺文化	257
第八节 明清时期的随州文学艺术	260

## 第四篇 民国时期的随州文化

<b>第一章 从经济社会看民国时期随州文化性质</b>	<b>267</b>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随州经济和文化性质	267
第二节 民国时期随州社会和随州民主文化的转型	270
<b>第二章 民国时期随州文化的内容及其发展</b>	<b>272</b>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随州地区反封建专制的民主文化	272
第二节 民国时期随州新民主义文化的发展	276

<b>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随州方言、风俗与宗教</b>	278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随州方言	278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随州风俗	285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随州宗教	289
<b>第四章 民国时期的随州教育</b>	291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学堂与学校之争	291
第二节 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之争	296
第三节 民族主义教育与殖民主义奴化教育之争	298
<b>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随州文学艺术、社会科学</b>	300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随州摄影电影书法绘画	300
第二节 民国初期随州戏曲艺术	301
第三节 民国时期随州人对工业文化与价值的选择	303
第四节 民国时期随州人的至善伦理追求	308

## 绪 论

随州市位于湖北北部，版图面积 9636 平方公里，跨北纬 31 度 19 分至 32 度 26 分，东经 112 度 43 分至 113 度 46 分，地处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交汇地带。为汉襄咽喉、鄂北明珠，其亦南亦北的文化交互区位构成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温床。炎帝神农氏在这里创耕耘、植五谷、尝百草、兴贸易。震惊世界的曾侯乙编钟在这里出土，其所承载的文化资源，将随州区域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为随州乃至湖北积累了一笔十分丰厚的重要战略资源。从历史的角度对此资源的形成及发展脉络进行整理，能使我们更全面更好地利用这笔丰厚的战略资源。

研究“随州文化史”，不能不先弄清“随州文化”这个概念；要弄清“随州文化”这个概念，又不能不了解“文化”这个概念。“文化”是很难下定义的。想给之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定义，几乎不可能。《英国百科全书》1974 年统计，世界上正式出版物中给文化下的定义达 160 多种，20 世纪 80 年代增至 350 多种，目前据说已经增至 500 多种。是不是还会增加？可能的。“你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就是定义“文化”的困难所在。

“文化”这个词，在德文为 Kultur，在英文与法文均为 culture，原从拉丁文的 cultura 而来。拉丁文 cultura 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敬神”等意义。因此，从“耕田”这种物质生产活动到“居住”这种生活方式，再到“习行”以至于“敬神”等宗教性精神活动，都可以称之为“文化”。“文化”这个概念的外延是如此之广，以至于可以说，举凡政治、风习、农业、税制、工业、交通、外交、币制、官制、法制、宗教、美术、教育、学术、科学、文学等内容，都可谓之文化。简言之，它“泛指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



心理、风俗等各个层面的一切制约人的行动的，内在的人文现象和景观。”<sup>①</sup>

我们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记述文化“有什么”，像对从“耕田”这种物质生产活动到“居住”这些生活实践，再到“习行”，以至于“敬神”等精神活动的记述，都属于“有什么”的范畴；二是概括文化“是什么”，就是对“耕田”“居住”“习行”“敬神”等活动进行家族相似性概括，并将这种家族的相似确定为文化“是什么”。我们所列举的这些现象，究竟有怎样的“家族相似性”呢？它们都是人的生活，此即它们之间最大的家族性相似。这样，我们对文化就有了一个初步的定义：文化就是人的生活。如果我们对这个家族进行成员性划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出两个小结论来：像“耕田”“居住”“习行”等属于以什么方式进行生活的问题，因而属于“生活方式”这个范畴，而像“敬神”等活动则属于价值选择的问题，这样一来“文化即人的生活”的初步结论可以被深化为：文化是概括人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选择的抽象范畴，它首先是人的生活方式的确定，其次是人对其生活价值的选择。从这个深化了的定义出发，“文化史”这个概念也就清楚了：它是指人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选择的演化史。

顺着这个路数，“随州文化史”这个范畴也就可以确定为：随州人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选择的演化史。

在“文化史”这个范畴的前面加上“随州”这一限制，相对于一般文化史而言，显然突出了如下两层含义：其一，它是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选择的演化在随州的表现，强调的是中国文化在随州，或者说，强调的是随州文化现象的共性或普遍性。其二，它是指在随州这个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历史文化，或者说是指在随州这种地域条件下所产生的生活方式及价值选择的演化，强调的是文化的特殊性或个性，即地域性。“随州文化史”研究不能截然将二者分开。以随州地域性为主要内容的“随州文化史”是中国传统文化史的一部分，同时中国文化史到了随州这个地方又必然获得地域性特征。换言之，传统文化史要通过一系列的地域文化史表现出来，而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史又都是传统文化史的家族成员。游离于中国文化史的地域文化史是不存在的。可见二者是个统一体。不过，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通过思维的抽象力给二者以明确的逻辑规定。从第一层含义研究社会生活中各领域的“人文现象”，属于一般文化史的研究范畴，而从第二层含义研究社会生活中的人文现象则属于特殊的即地域文化的研究范畴。从此出发，随州文化史研究必

<sup>①</sup> 参看丁帆《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论纲》，载《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

须进一步追问随州人所确立的生活方式及价值选择的演变究竟怎么样。

“随州文化史”所要研究的是受着随州的地域、历史条件限制的“地域文化史”。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供人们进行研究的“随州文化史”？

我们在进行文化史研究之前，必须先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有无可供研究的随州文化，二是随州文化的基本特点，三是随州文化的演变过程。有无可供研究的随州文化？回答无疑是肯定的。无论是从文献、考古上来看，还是从方言、传说来看，随州这个地方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料可供学人进行研究。过去，我们曾从形态学的角度，将随州明清时期以前的文化现象概括为史前时代的始祖文化、奴隶制时代的侯国文化和封建制时代的郡县文化。这种概括在明人颜木所纂的《随州志》就已经有了。他说：“我故国也。秦汉而下，郡县军州。”“故国”是指随厉唐三个侯国，“郡县军州”是指秦一统中国后的随地建置。这里颜木似乎只谈了两种文化，但事实上，他对随州历史的叙述是从炎帝神农氏开始的。颜氏指出，开辟之初，三皇之世，孔子不言，阙所疑也。“包犧氏没，神农氏作，不言所起也。记曰厉山氏。左氏曰烈山氏。《史记》曰烈山实厉山。皇甫谧曰：厉山，随之厉乡也。”接着他又讲，黄帝制天下，立万国，随兴否，未可知也，讲到周初，就有了“境内三国，我唐皆姬姓”等等。其叙随州文化史的脉络十分清晰：始祖文化（炎帝神农氏）——侯国文化（鄂随厉唐）——郡县文化（郡县军州）。我们所做的，只是将颜氏没有明确的思想更加明确化而已。随州始祖文化是一种原始氏族文化，其以植五谷为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是生产资源氏族集体所有；侯国文化（鄂随厉唐武）从国史的角度看是夏商周时代的文化，其时社会结构表现为国野即城邑与乡村之分，氏族制度仍然保留了下来，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旧邦”观念，土地财产表现为国有或氏族贵族所专有，但是礼仪已经被阶级化了，“其命维新”的观点盖由此来。在这一阶段，随州文化由史前生产方式的奠定进化为以农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制度、价值体系的构建。至此，随州文化从生产生活方式到价值选择的创制工作基本完成。在这个创制过程中随州文化都站在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上游。郡县时代的随州虽然也有文化创新，但这个创新本于侯国时代的已经成型的文化，所以它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高峰。从随州文化史的角度看，将随州文化“有什么”概括为以上三点并不全面，因为随州文化还有一“态”，那就是中国民主革命后的随州文化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国民文化”。以上四态，构成了随州文化“有什么”的内容了。不过在研究第四态时，我们截止于1949年，1949年以后的随州文化，我们放在“当代史”的范畴。

现象的盘点也即意味着本质的追寻。始祖文化形态，即以烈山文化为核心的炎帝神农文化，构成随州文化在其发展中的第一次浪潮。在这个浪潮，随州人的生活方式为植五谷的尚农生活，其精神层面是重稷祀。开始是祭烈山氏之子柱，后来是祭周人的先祖弃，这就是所谓的“神农”；侯国文化形态，即以曾随文化为主体的随地文化，构成随州文化在其发展中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在第二次浪潮中，随州人将所祭之神理解为人，强调民为神主、君忠于民。这就是季梁思想，三次浪潮的内容是曾侯乙编钟所反映的礼乐文化，其核心点是强调和。如果说，第一次浪潮确立了随州人的尚农生活方式，那么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则确定了随州人的以民为本，以乐为和的实用价值取向。这里，我们从随州文化“有哪些”中追寻到了随州文化“是什么”的答案：民国以前，随州文化是以尚农精神为基础的，以民本、礼乐为价值取向的地域文化。

随州之所以能产生如此丰厚的文化，这与随州的地理位置有关。在地域文化的空间里，随州地处长江与黄河流域的中间地带，北接中原，南连江汉。历史上的南北经济、文化大都通过南阳盆地经过随枣走廊而在随州交汇。她具有十分明显的南北过渡的地域特征。如在传统农业生产活动中，随州是北方农作物的南限，又是南方农作物的北限。“南北兼有”是随州的农耕文化的独特景观。随州文化的形成与其南北兼有的文化空间组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使随州文化表现出了亦北亦南的过渡性特征，例如随州的戏曲文化既有北方调，又有南方音，可谓是南腔北调。虽然我们不能说，随州历史文化的形成完全取决于其地域特征，但其地域特征必然造成随州接受四面八方文化的优势，必然造成随州糅合南北文化的基本条件。

在考古学界早就有专家以这一观点来审视、研究随枣走廊的文化遗存了。武汉大学历史系方酉生教授在研究随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时说：“随州市的北面大致以桐柏山脉与位于中原地区的河南省南面的信阳交界。在桐柏山以及其东北面的大别山的南北两侧，分布有众多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遗址。这说明此地已经到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石家河交接的边缘地区，也是上述几种古文化相互吸收融合的一个地区。根据考古调查的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随州地区分布的古文化遗址，数量众多，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南北交融，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sup>①</sup> 随州史前文化是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曾随文化也是如此。

---

<sup>①</sup> 《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82页。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吴量恺教授在分析曾国文物的文化内涵后得出结论：曾随文化是南北文化结合部中发展延伸的一条东西向的汉东文化带。据此，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说，在南北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兼有南北文化之长的，并形成了一种具有特质文化圈（或称文化带）”，他认为，这个文化带“反映着南北文化交融，重构杂糅与创新整合过程，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发展趋势。我们是否应该以此作为考察随州文化发展的基本视角，构建与展望历史文化名城随州。”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在随枣走廊，主要是随州地区，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可供人们进行研究的“随州文化”。<sup>①</sup>我们可以用“文化带”这个范畴来概括随州历史文化，并且强调它具有自己的演化历史。上面所说的三次浪潮是演变，其上限在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时代，新石器文化时期的雕龙碑文化、西花园文化等为其对应物。雕龙碑文化遗址虽然在湖北省枣阳市，但它离炎帝神农氏的活动区域即“厉乡”不到100公里，在烈山氏的中心活动区域。接着是战国中期的晚段，准确地说，在随（曾）之亡国期。从雕龙碑文化到随之亡国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生活在随枣走廊地区的先民们融合南北文化之长，创造了其独特的地域文化<sup>②</sup>。下限截止于1949年以前。随被楚亡，其文化被楚化，相对于楚而言，其地方性渐淡；楚亡于秦，天下书同文、车同轨，中国进入了漫长的封建时期，各地文化受大一统文化格局支配，随州文化的地方性色彩更淡。同时再也没有像始祖形态、侯国时代那样，表现出形成高峰的旺盛创造力。虽然封建时代的随州文化也有其精彩之笔，但没有形成文化封顶。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随州文化进入了民国时期。随州人对工业文化的选择，使随州文化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研究随州文化史必须注意处理好曾随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楚文化”这个概念，广义地讲是指“湖北区域文化”，“湖北”被称为“荆楚”；狭义地讲，是指“楚国的文化”，是指楚国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就广义而言，“随州文化”属于“楚文化”，就是说，它是“湖北区域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就狭义讲，随文化虽与楚文化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但它并不就是“楚文化”，而是由随国人、厉国人、唐国人创造的，主要是由随国人（曾国）创造的。其实，

<sup>①</sup> 引文见《炎黄文化与名城随州》，湖北人民出版社，第60页、74页。

<sup>②</sup> 主持发掘雕龙碑文化遗址的王杰教授认为，雕龙碑文化肯定与炎帝神农氏有联系，其生产形态几乎是史料记载的炎帝神农时代的脚注。（参看李厚义、刘永国编《炎黄文化与随州》，湖北人民出版社，第252—253页）。

随州历史文化是湖北地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而又抢眼的构成要素。它甚至可以与湖北地域文化的主体部分——楚文化相提并论。《左传》等书显示了这一点，战国伊始，中国就流传“和氏之璧，随侯之珠”一语，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随曾文化的确是湖北区域文化的独特景观。

人们常常将华夏文化分成北方与南方、黄河与长江两大块。楚文化被楚学家们视为南方或长江文化的代表而与北方并列。殊不知，在南方，在古代，曾随文化与楚文化是并举的。如《左传·桓公六年》所记载的“武王侵随”，就是这种并举现象的反映。当时二国的关系相当紧张。楚人对随的认识是，“汉东之国随为大”。虽然当时随之国势正在走衰，但是楚人认识到，如果随侯修政，那么楚还是“不敢伐”的。所以武王侵随时，首先“使薳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而随人对楚的认识是“天方授楚”，即认为楚之国势正处于上升时期，随未可与之言战，所以当楚“军于瑕以待之”时，随人则“使少师董成”。两国最终缔结了和约。可见在春秋早期的湖北地区的政治力量是楚和随唱主角，保持了一种并举关系，而在此前，随强于楚；此后楚盛强于随。

随成为楚之附庸国可能始于公元前 640 年。据《左传》记载，这年“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冬，楚斗穀於菟帅师伐随，取成而还。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已，而由人乎哉？’”随以自己是汉东诸侯而不属于楚为由叛楚，最终被楚“取成而还”。大概从此时起，“随”在政治上与楚的并列并系，开始变成附庸关系了。到了前 524 年前的楚吴长岸之战，楚王“使随人与后至者”守战胜品，一个“使”字，点明了楚随主从地位。不过，这里的主从关系是政治上的，而在文化上，春秋至战国时期，随楚仍然能够保持着一种并列关系。这种并列关系已经深刻地烙印于中国文化本身了。例如有个成语叫“珠联璧合”。“珠”是指“随侯之珠”，“璧”是指楚国的“卞和之璧”。二者过去称为“随和”。旧《辞海》“随和”条目注释：“随侯之珠，卞和之璧，皆至宝也，故随和并称。”此称可能始于战国时期的李斯《谏逐客书》：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魏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於秦

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

和氏之璧是楚文化的象征，随侯之珠是随文化的象征。李斯将随文化与楚文化的象征并举，此为世人认同，此足以说明，像楚文化一样，曾随文化是湖北区域文化中与楚文化同样重要的文化景观。

如果我们做更深入的研究，则不难发现，曾随文化曾是楚人学习的对象，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随文化的精神营养，可谓“楚承于随”。

在神话传说中，随文化是楚文化的继承对象。炎帝神农文化是曾随文化第一次浪潮的主要内容，而祝融文化实即楚文化的源头。楚人则重祝融。祝融，名重黎（简称黎），又称祝诵、祝和。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表明，楚人自认其为祝融的后裔。史载楚国别封之君夔子由于不祭祀祝融和鬻熊，被楚人视为大逆不道，惨遭灭国之祸。被楚人尊为始祖之神的祝融其实是凤的化身。《白虎通义》说：“南方之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是凤。可见，凤与祝融是合一。祝融，在中国神话与传说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有人甚至将其纳入了三皇五帝的范畴，但是其重要性不能超过炎帝神农氏。《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訥，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

在这个世系中，祝融是炎帝的第五代孙。可见祝融是炎帝的继承者。这就意味着，炎帝文化是源，而祝融文化是流。后者是从前者而来的。

当然，在《山海经》里，也有祝融是黄帝后裔的记载，如《海内经》中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颛顼。《大荒西经》则补叙为：“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此说为司马迁所重视，《史记·楚世家》说：“高阳者（帝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炎黄文化是并举的。祝融或为炎帝后裔，或为黄帝后裔。无论其为炎帝后裔，还是为黄帝后裔，都不能改变祝融是炎或者是黄的继承者的事。这就是说，与祝融氏相比，神农氏在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祝融次之，最终没有进到“人文始祖”的层级。

从信史上看，曾随文化是楚文化的学习对象。据《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

狂生熊绎。”楚人的信史时代就是从“鬻熊”开始的，“鬻熊”揭开了楚国文化的序幕。与楚国相比，随国的历史要早得多了。随国，亦称曾国。随是他称，曾是自称。曾国的信史，可以见之于商代甲骨文。这就是说，早在商代，就有曾国了。叶家山古墓群的发掘显示，商周之际曾国即已经十分强盛，其文化成就十分辉煌。

后来的曾侯乙编钟，在这个时代就已经有技术和文化准备了。而在其时，楚国尚处在筚衣蓝缕的创业过程中，其文化无法与曾国文化相比。中原文化是楚人学习的对象，而楚人是通过随向中原学习的。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记载：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

在前面，我已经分析，公元前706年楚国势正旺，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楚人还是自觉其为“蛮夷也”，因而想通过随来“观中国之政”。有人将观中国之政解释为“介入中原政局”，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观中国之政”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所以楚文化中有大量曾随文化因素。著名的楚史专家张正明曾说，楚“观中国之政”曾从随国季梁的理论中受益。<sup>①</sup>

楚人不仅通过随人观中国之政，而且还从中学到了随人的精湛青铜铸造技术。商周之际掌控长江中游有色金属资源的并不是楚国，而是曾国。传世的春秋早期的《曾伯簠铭》：“克狄淮夷，印（抑）燮繁汤，金导锡行”。这就意味着，从春秋早期往上溯，曾国掌控了长江中游的铜资源，所以春秋早期长江中游的铜器铸造水平以曾国为最高。<sup>②</sup>在这种情势之下，楚国的青铜铸技术不能不受到曾国的影响。例如，在湖北当阳赵家塝楚墓群的西周晚期楚墓中出土的青铜鼎、簋在形制、

① 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② 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